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 中国共产党、人民、资本

——基于改革开放40年跨越发展经验的探讨\*

郑有贵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动摇提供了保障,进而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全社会形成跨越发展合力。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跨越发展奇迹的根本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人民;资本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8)08-0073-07

人民、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立场问题。如何处理人民与资本的关系,是基于人民的立场,还是资本至上和服务于资本所有者,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多元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博弈,坚持人民立场,探索并逐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方式和政策体系。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了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实现

是否利用和如何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先后提出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作为提高生产力、活跃商品流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国

家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是否利用和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展的余地。”<sup>[1](pp.1431-1432)</sup>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明确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把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纳入国家计划管理、公私合营等方式,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国家发展。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没有可能,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对中国实施禁运封锁。<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主导经济运行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需要引进严重不足的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避免陷入资本至上,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能否探索出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有效实现形式。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从实际出发,积极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并逐步探索出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是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论和制度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大致可分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小的阶段,这种经济形态的不同,使得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也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前,对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实现形式的探索,是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取向下进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之一之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sup>[2]</sup>当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主

要是通过收购、统购、包销、经销、供销、加工、订货等,把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进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牟取暴利、盲目发展等减少对国计民生的不利影响,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这一时期还开始探索实施公私合营。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反映: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凌驾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国营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利多害少,以至有利无害。<sup>②</sup>在实施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及对私人股支付定息方式,促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具体做法是,资本家将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统一调配,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额,付给资本家固定股息。1957年7月,国务院规定不分工商、大小、盈亏、行业、新老合营企业的公私合营中的私股额,统一支付5厘定息(个别企业可以超过)。原来的资方人员由国家适当安排,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而是转换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如此,资本家的股息与企业的经营成果脱钩。中国对私人股实行定息收益的赎买政策,避免了这样的制度变革可能导致生产力破坏现象的发生,既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推进,也促进了生产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取得明显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由改革初期的积极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如何更好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第一,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加之配套的国家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的使用,引导包括多种所有制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源向先进生产领域聚集,形成聚沙成塔效应,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促进了

<sup>①</sup>参见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29页。

<sup>②</sup>参见《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276页。

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破解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一盘散沙不能形成发展合力的问题,是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经验所在。第二,通过探索完善多种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好地实现公有制经济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第三,鼓励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主导下,发挥外资和私人等多种所有制资本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员工参股持股,以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针对非公有制企业随意解雇员工、不将员工纳入社会保障等问题,国家制定劳动合同法等,为保障员工在企业中的权益提供法律保障。第四,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又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把蛋糕分好。如外资的引入,不仅有利于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还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国内企业竞争意识的增强,加之也引进了先进技术,进而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有更强大的财力实施二次分配,以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促进共享发展。

中国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胆略,源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源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正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针对“三资”企业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担心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sup>[3](pp.372-373)]</sup>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了有利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从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引进资本兴办“三资”企业,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进行的,先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0年代初面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全面私有化。这些都给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顶住了各种挑战,始终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体上看,这一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渐进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推进增量改革突破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强调:“《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sup>[4](p.251)]</sup>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的理论,也学习借鉴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促进国家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成功经验,从本国实际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伟大制度变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所有制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起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加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有利于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但随之也衍生出与较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工农及其细分产业部门、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不适应的新问题,对各方面的激励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生活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中国针对改革开放前发展较单一公有制经济存在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实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量改革。第一,实行允许知识青年返城的政策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弱,导致大规模知识青年返城后就业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政策上开口子,允许在城市发展个体经营,先期主要发展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业。第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加之逐步允许农户购置大型运输工具和雇工,农户不仅成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个经

营层次,还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村个体经营也快速发展起来;社队企业则在1978年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第三,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资本严重短缺的约束,我国大胆引进外资,1979年7月1日就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引进外资兴办合资经营企业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些增量改革,与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三主三辅”经济构想<sup>[5]p.13</sup>的逻辑是一致的,不同于改革开放前对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条化理解<sup>[6]p.310</sup>及其逻辑,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下的重大突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党的十三大作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更加明确了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主动地完善所有制结构。

第二个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通过增量与存量并进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80年代,中国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等改革,激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实现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在快速推进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一方面,公有制企业承担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的“办社会”负担,这种成本构成的差异,使国有企业因负担重而处于成本劣势,非公有制企业则有不承担“办社会”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与非公有制企业相比活力不足,加之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欠款的“三角债”,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国家面对国有企业的困难,没有放弃发展公有制经济,而是采取措施解决公有制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一是解决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又形象地称为“抓大放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的问题,实施构建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主体;将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在产权制度的快速变化中,由于实施方案的不完善,加之不少地方政府还先将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国

有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形象地比喻为“靓女先嫁”),一些国有资产流失了。尽管如此,通过改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实现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此,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21世纪的头十来年,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提出和实施“两个毫不动摇”。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对公有产权还是对私有产权都明确规定不可侵犯,2007年还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期间发生了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之争。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小煤矿等(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受到较大冲击,有人以此为契机,在讨论“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中为私有化营造声势。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明确地提出和实施“两个毫不动摇”。

第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非此即彼的逻辑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公私合营,目的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堵住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路。1978年以来的很长时期内,尽管发展“三资”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乃至将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仍然没有摆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非此即彼的逻辑。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下,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焙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同时不少非公有制企业发育成长,成为行业的骨干,有的还在国际上处于引领地位。在这样一种发展格局下,如何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成为需要破解的新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

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sup>[7]</sup>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跳出了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非此即彼的逻辑。为避免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再发生,国家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2017年12月30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正演绎“大象快跑的故事”。到2017年年底,全国国有资产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60.5万亿元,比2012年年底增长约一倍,上缴税费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4,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1/5。其中,2017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4万亿元,创了历史最好水平,有41家中央企业利润额超过百亿元。国有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骨干和引领作用,在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2017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有67家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在前五名里占据三席。<sup>[8]</sup>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sup>[9]</sup>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创新性地探索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创新,形成了新的发展优势: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而充满活力;又通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主导地位,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载体、中坚力量,保障了国家战略的实施,也保障了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正是这样一种优势,成就了多种所有制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活力

竞相迸发,才有了中国跨越发展的实现。

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成功实践,提出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融合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实践和创新发展的。

###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有利于人民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保障,根本源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后者遵从资本至上的价值取向及其逻辑,形成并固化资本控制的国家治理体系,服务于资本而不是人民。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鲜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sup>[9]p.483</sup>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排除各种干扰和挑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动摇。

第一,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发展战略、发展理念等各个方面,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有利于实现跨越发展的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和实现机制,破解了由于生产力落后而在国际竞争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大国如何突破“贫困陷阱”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共享发展理念等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党

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正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的探索 and 不断完善,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这种态势与全球经济波动甚至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无论面临何种严峻困境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都能够不放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攻坚克难中保障人民的利益。其中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引进外资中保障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大差距的压力下,没有因此而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在极需要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和先进技术之际,不是选择资本主义搞资本至上,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引进资本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992年,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sup>[13](p.373)</sup>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地方为了引资,或多或少存在在投资方与员工、当地居民利益上向前者倾斜的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决扼制了这一问题的发生。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阵痛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推

进改革,包括既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也得到人民群众从大局出发克服暂时和局部困难,配合改革推进。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国有企业人员较多不利于进一步发展的问題,国家实行减少部分职工来增效(当时简称“减员增效”),得到了下岗职工顾全大局的支持配合。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国家对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不是简单推向市场,而是不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还通过实行财政支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开展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以实现新的就业创业,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成就了新的事业和实现了人生价值。与之不同的是,俄罗斯在改革中实施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实现私有化,还把就业问题完全交由市场解决,给人民当时的生活造成较大困难。在国内,当时也有人主张学习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把所谓的长痛不如俄罗斯那样的短痛作为理由。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广大职工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我国勇于推进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改革。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中央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不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8倍,避免了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转型促发展,变转型发展阵痛为转型发展动力。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进入国际上一般都存在的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矛盾凸显期,<sup>①</sup>提出了发展转型的命题。以解决其中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问题为例,这必然会导致发展速度下降的阵痛。在面对为实现赶超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中留下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并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如此,我国还积极促进《巴黎协定》的实施,而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在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以往对产

<sup>①</sup>参见《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2页。

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并切实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3—2017年的5年间,在淘汰水泥、平板玻璃等落后产能基础上,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加大去产能力度,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110多万分流职工的安置,承受住了转型发展中的阵痛,促进了新动能的培育壮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sup>[10]</sup>

第四,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不断完善实现这一价值取向的政策体系,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根本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4](p.283)</sup>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sup>[4](p.285)</sup>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西方思潮对中国产生冲击,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还特别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高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sup>[11]</sup>在现实中,也存在有的党政干部利用职权谋私利而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在面对腐败时,敢于说“不”,以保障人民利益。正是有了在各种挑战和困境中不忘初心,不惧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可贵坚持,中国共产党才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像俄罗斯、东

欧等国家那样转到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保障了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有利于人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不动摇,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促进了全社会形成跨越发展合力。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跨越发展奇迹的根本经验。这些表明,在中国,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孤立的政治问题,不是形而上学地讨论多党轮流执政还是一党执政的选择问题,不是单一的历史选择后能不能变的形式逻辑问题,而根本在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人民与资本的关系,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和实现机制,进而形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态势。这给出了重要的理论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人民日报,1949-09-30.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 [8]白天亮.国企民企,携手迈向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18-02-07.
-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8-03-23.
- [11]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

责任编辑:景怡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Integrating Core Values into the Rule of Law:** China is engaged in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for China, the integration of core values and legal construction boasts of th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and enjoy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who have accomplished the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ion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although it is faced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e shall thoroughly study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core values into legal construction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devote ourselves to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sustain the rule of law with core values,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in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and law abiding. (Qin Wen)

**A Pathway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by Giving the Cultural Value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such as Qingming Festival into Full Play:** Cultivating and practis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ideology and the common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unity and striving of the whole party and all the peop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shall stay close with people's real life, and deliberately build up a discourse system welcomed by the masses. The culture of Qingming Festival embodies uniqu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sign close to people's real life and contain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s native land emotion. It is undoubtedly an effective pathway to cultivate and practis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rough virtual cultures of Qingming Festival by inheriting and surpassing native land emotion and giving the cultural value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such as qingming festival into full play. (Zhou Yi-shu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Initiated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of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 and economic ethics,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topics concerning researches on great virtue, public morality and private morality. Being "honest and upright" is not only equal to political morality, 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morality for resolving current problems and eliminating their root causes. Being "honest and uprigh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officials, the fundamental discipline for self-cultivation, self-restraint and family rule, and the constant conservation. Hence, cultivating "clean and upright" officials, resolving current problems, and eliminating their root causes is not punitive but fundamental and intrinsic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Lu Xiao-he)

**The Entities of the CPC, People and Capital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Forty-Year Leapfrog 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ensures capital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serving people and socialism,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socialism,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arket economy, and unshakably consolidating "people-center" value, furthering socialism to their advantage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These are the essential experience from the accomplishment of China's miraculous leapfrog development for forty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hich manifest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You-gui)

**The Change of China's Production Mode and Its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downward trend of labor income shar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as become a heated topic for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is rare to see academia of Marxist economics, who should theoretically focus on the issue of labor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ppl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mpirical analysis. If we unit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into one frame, we could find out that China's production mode has evolved from "Marx-Adam Smith" pattern to "Marx-Hayek-Keynes" pattern. Hence, wi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ayesian Bootstrap method, we could find that the "Marx-Adam Smith" pattern did not have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labor income share between 1978 and 1992; the effect of "relatively diversified structure of ownership" on the reduction of labor income share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capital input dependence" on the increase of labor income share between 1993 and 2013; and the effect of "Marx-Hayek-Keynes" pattern on the reduction of labor income share is starkly bigger than that of "Marx-Adam Smith" pattern. (Gan Mei-xia)

**The Reform of Domestic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ollective Econom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mestic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successively gone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land owned and run by farmers", "land owned by individual farmer but collectively run by farmers", "land collectively owned and run" to the present stage of "land collectively owned but run by farming famil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played a huge role while it has also been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emerging problems. The privatization of farmland could hardly work out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under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us, we sha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China's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spread the experience from Tang Yue County, transform the operation of farmland to collected and untied management on the premise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strength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ai Shuang-xing and Li Jian-ping)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Capitalism: Commemorating the 17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late 1970s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coupled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s. Resources and wealth has been incrementally moved to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course of global accumulation and expansion. In wake of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apitalism took on tremendous changes. Based on that, the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society and class antagonis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s there has been alliance as well as separation in capitalist class with the decay of class recognition in the working class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long term, capitalism is sure to be replaced by socialism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battles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Xie Chang-an and Ding Xiao-qing)

**Marxism and a New Strategy for North American Left-Wing: A Review of New York Left Forum in 2018:** Themed with "Toward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Left", Left Coast Forum 2018 was held in New York, and attended by left-wing scholars, party lea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left-wing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left-wing social activists. Left-wing scholars observe that Marxism is composed of significant methodology and systematic ideological system. Given the fact that Donald Trump has imposed unsteadily dangerous factor on the ord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maj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s in need of independent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We shall dialectically study the views and need of left-wing scholars. (Zhang Xin-ning and Zhang Xiao-ming)

(翻译:张剑锋)